

# 中美政治语篇地名转喻的意识形态研究<sup>\*</sup>

陈敏 周宜珊 倪锦诚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提 要:** 本文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中美政治语篇中地名的转喻性用法进行实证研究,尝试依托自建语料库语料透析潜存于转喻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基于英汉新闻报刊中有关中美关系话题的语料,借助 USAS 语义标注软件,按转喻识别程序,识别并概括出“地点”(次级)转喻模式,进一步的卡方检验从概念和话语层面更为精确地描绘出该转喻的分布特点与分化粒度。研究发现,中美政治语篇中“地点”转喻反映概念与话语层面上的使用特征,对潜存于背后的隐性的意识形态具有加强与建构作用,因此转喻成为中美媒体表达其政治观点与评价偏见的载体和实施后台操控的工具。

**关键词:** 概念转喻;地名;政治语篇;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3-0038-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3.007

## Ideological Functions of Metonymy: The Metonymic Location Nam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s

Chen Min Zhou Yi-shan Ni Jin-che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ideological functions of metonymy by exploring the metonymic location nam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s. Based on evidence extracted from the self-built corpora of the news articles on Sino-US relations, and with the aid of USAS Semantic Tagger, the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ideological motivation in the use of PLACE metonymies. Following MIP, it identifies and concludes the (sub)models of PLACE metonymie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se metonymies based on the chi-square test from conceptual and discursive parameters sketches out their distributional features with finer granularity, the coverag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same metonymies in two media discours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metonymies, while operative on an embodied basis, are actually tied up with and reinforce the hidden ideologies of discourse communities, and thus become the carrier of the political stance or disposition, and evaluative partiality of two media groups, implicitly exercising the manipulative check on their audience.

**Key words:** conceptual metonymy; location name; political discourse; ideology

### 1 引言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并不是简单的词语替代,只有指称的功能,而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一种认知现象(Taylor 2002:342)。转喻本质上是概念性的,是发生在同一域矩阵内的映射(Croft 1993:348)。转喻映射属于域凸显的识解方式,即将域

矩阵内的次认知域置于突显地位。

传统的转喻研究主要依托研究者的语言直觉或以词典语料为基础,且研究的样本十分有限(如 Stallard 1993, Fass 1997),因此很难准确描述转喻的整体分布情况(Markert, Nissim 2003:176)。目前,认知语言学基于用法的研究范式引发学界对自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语阅读记忆系统的交互性研究”(15BYY101)和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话语中的隐喻研究”(SK18ZD07)的阶段性成果。

然语言中转喻研究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基于语料库较大范围语料考察专有名词的转喻性用法成为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为此做出有益的探索:Markert 和 Nissim(2003, 2006)设计标注方案,对地名和机构名转喻进行研究,以检测转喻的再现性、覆盖范围和粒度;Cornelissen(2008)、庞陈婧璇和刘永志(2014)分别探讨英语中的公司名称和中国自然景观名称形成的隐转喻机制;Brdar 和 Brdar-Szabó(2009)与 Zhang 等人(2011)分别从跨语言变异与语言变体变异的视角考察地名转喻的使用,其中 Zhang 等学者重点考查大陆和台湾新闻语篇中首都名转喻的分布情况,借助转喻标注和定量分析描绘出反映在语言内部的变异,进而识别并确定影响转喻使用背后的因素。

综观过往研究,在肯定其贡献的同时,也不得不指出,对转喻的社会文化属性以及意识形态功能的探讨虽有所涉及但尚显不足。(Zhang et al. 2011:108)有关新闻媒体语言与意识形态关联性的问题,学界已达成共识(如 Fairclough 1989; van Dijk 1998; Kristiansen, Dirven 2008; 陈敏 2010; Koller 2014)。鉴于政治新闻的意识形态性更为凸显,本文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中美政治语篇中地名转喻进行研究,尝试从概念和话语层面考察该转喻的分布情况以及产生的分化,以揭示转喻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语料

本研究基于自建的拥有 50,177 和 52,571 字数的英语和汉语语料库<sup>①</sup>,分别由 2015-2016 年期间关于中美关系的政治新闻语篇各 50 篇组成;语料随机取自于权威性的新闻报道平台“华盛顿邮报网”与“人民网”。转喻语料提取的步骤如下:首先,借助英国兰开斯特大学(Rayson 2008, Piao et al. 2015)开发的 USAS 语义标注工具检索英汉语料库中的地名,即被标注软件语义赋码为“Z2”(地理名称),同时词性标注为“NP”(英语)与“NR”(汉语)的专有名词,包括国家、城市、行政区、岛屿、海域等;然后挑选出英汉语料库中出现频次前 10 位的地名(中国、美国、华盛顿、北京、南海、日本、东京、台湾、西雅图、上海),创建地名列表,并据此对转喻语料进行穷尽性搜索;最后,经语境还原,对转喻逐一识别与确认,方法简述如下(详情参见 Zhang et al. 2011:95):(1)确定地名的语境意义,即该地名如何适用于语境中的实体、关系或属性;(2)确定其基本意义,即表

处所的通用意义;(3)确定其语境意义是否与本意义形成对比,并形成某种毗邻关系;(4)若结论为是,则将其标记为转喻,并标注出目标域。

表<sub>1</sub> 英汉政治语篇地名转喻分布表

转喻模式	英语语篇		汉语语篇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地点代(PLACE FOR)				
机构(INSTITUTION)	320	94.96%	275	87.86%
(1)政府(GOVERNMENT)	294	87.24%	230	73.48%
(2)军队(ARMY)	22	6.53%	36	11.50%
(3)企业(COMPANY)	4	1.19%	9	2.88%
居民(INHABITANT)	6	1.78%	26	8.30%
实力(POWER)	11	3.26%	7	2.24%
产物(PRODUCT)	***	***	5	1.60%
合计	337	100%	313	100%
标准化频率(每千词)	(337/50177)*1000=6.71		(313/52571)*1000=5.95	

依照上述方法,我们从两个语料库中提取到大量的转喻语料,经归类整理得到反映地名转喻分布情况的表<sub>1</sub>。该表显示,政治语篇中英汉语地名转喻的使用情况具有以下特征:(1)地名转喻在英汉语篇中普遍存在,每千词的疏密度分别为 6.71 和 5.95;(2)语料库中发现的转喻类型与 Radden 和 Kövecses(1999)的归类相吻合,除“地点代事件”外,其他 3 种规约转喻均有出现,此外,还提取到“地点代实力”的非规约模式;(3)“地点代机构”为英汉语篇中最具统摄性的转喻模式;(4)汉语语篇中的转喻类型更为丰富,除 3 种共享模式外,“地点代产物”为其所特有。

### 2.2 研究参数

除简单的频数统计外,研究还设置 2 个参数。借助卡方检验,从概念和话语两个层面进一步描述英汉语篇地名转喻的整体分布情况,以期发现更深层次的特征。

#### 2.2.1 概念参数(政府参数)

概念参数在本文中指以转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为考察对象的相关参数。鉴于“地点代政府”在英汉语篇中均为最具统摄性的转喻模式,我们以目标域为参照点,设定“政府参数”对源域作进一步分析。根据源域,我们将地点<sup>②</sup>划分为“国家”“城市(首都)”与“行政区”3 类;“城市”又进一步赋值为“首都 A”(=华盛顿)、“首都 B”(=北京)、“首都 C”(=与中美不相干),考察英汉语篇中“政府”转喻的具体例示是否存在差异,以便描写出概念层面的次级分化特性(subdifferentiation)。

#### 2.2.2 话语参数(事件参数)

研究还设定事件参数,从话语层面考察转喻

的分布情况。事件参数指与语料所涉及的具体事件框架相关的预测参数。语料库语篇主要关涉3个事件,分别赋值为:“事件A”(=第七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事件B”(=习近平访美)和“事件C”(=南海问题)。借助统计分析,考察事件这一变量是否会影响转喻的选择,二者是否具有相关性。

### 3 基于政治语篇语料的“地点”转喻分析

英汉语篇共享3种转喻模式,即“地点代机构”“地点代居民”和“地点代实力”,而“地点代产物”是汉语语篇独有的模式。

#### 3.1 英汉共有的转喻模式

##### 3.1.1 地点代机构(PLACE FOR INSTITUTION)

##### 3.1.1.1 地点代政府(PLACE FOR GOVERNMENT)

鉴于研究语料主要为关涉中美两国关系的新闻报道,“地点(首都/国家)代(国家)政府”这一转喻模式在英汉语篇中普遍存在。如以下各例所示,例①、③中的城市名“华盛顿/Washington”“东京”和“Beijing”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政府的所在地,此处转指这3国的国家政府;根据语境判断,例②、④中的国名“中国/China”和“美国”在句中并不表处所,而是转喻性地代表两国政府。

① 美国《福布斯》称,华盛顿和东京看来正组成压制中国的“二人组”……

② 中国坚定致力于同美国共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③ Tensions ris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over man-made islands.

④ China says it will commit \$3.1 billion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 3.1.1.2 地点代军队(PLACE FOR ARMY)

地点转喻的目标域“机构”还可例示为“军队”。如例⑤、⑥“美国/United States”与“中国”其语境意义“(该国)军队”与基本意义“处所”形成毗邻关系,激活“国家代军队”的映射。

⑤ 美国不会侵略中国本土,中国也不会去攻占美国。

⑥ Obama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ail, fly or operate anywhere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 3.1.1.3 地点代企业(PLACE FOR COMPANY)

英汉语篇中有关加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报道常采用“地点代企业”的转喻模式。例⑦、⑧由实体“美国企业”与 foreign companies 突出出

“中国企业”在“(国家)中国”认知域矩阵中的焦点地位,从而表达其转喻意义。

⑦ 中美关系发展好了,美国企业同中国的合作就有了更好条件。

⑧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one of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markets, foreign companies must help China build brands. . .

##### 3.1.2 地点代居民(PLACE FOR INHABITANT)

“地点”常与“居住在该地点的人”形成转喻性的联系,如例⑨、⑩“中国/China”所示,“国家”转指“该国的居民或消费者”。这一“地点”与“居民”间的转喻关系也常被视为一种“容纳”图式,是上位转喻“容器代内容”的具体示例。

⑨ 从1949年新中国开始到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美国在中国眼里都是美帝国主义,是百分之百的敌人……

⑩ The lesser-known side of the story is that China is also now a major consumer of U. S. goods.

##### 3.1.3 地点代实力(PLACE FOR POWER)

英汉语篇中还有“地点代实力”的非规约模式,如例⑪、⑫“中国”与“China”所示:次认知域“中国的国力”被置于“国家中国”认知域矩阵中凸显地位,从而激活“实力”转喻。

⑪ 副总统拜登强调希望看到中国崛起,无意遏制中国发展。

⑫ China's growth has had a big influence on the way wealth is distributed around the world.

#### 3.2 汉语独有的转喻模式

“地点代产物(PLACE FOR PRODUCT)”这一转喻模式在汉语语篇具体化例示时,目标域选择同一域矩阵内“文化”这一抽象的非物质产物,如例⑬、⑭,激活“(文化)产地代(文化)产物”的次级转喻映射。其中,例⑬“北京”和“西雅图”经过“部分代整体”与“产地代产物”的连锁转喻映射过程后,分别转指中国与美国文化。

⑬ 北京遇上西雅图,外媒频频点赞习近平西雅图之行。

⑭ 另一类是对中国感兴趣却由于资金等条件限制无法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

#### 3.3 统计分析

##### 3.3.1 概念参数(政府参数)

根据“政府”参数的研究设计,得出以下统计结果(参见表<sub>2</sub>):(1)以“国家”为源域(即国家代政府)的转喻是其下使用频率最高的次级模式,尽管汉语语篇的分布频率(209频次/90.87%)明显比英语语篇(181频次/61.57%)高,但p值

并不具有统计意义( $p = 0.337$ );(2)以“首都”与“行政区”为源域(即首都代政府与行政区代政府)的两类次级转喻在英汉语篇中的分布情况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p < 0.001$ )。这表明,与汉语语篇相比,英语语篇更偏好这两种转喻模式;(3)以“首都”的次级范畴为源域的转喻,“首都 A (= 华盛顿)代政府”的模式在英汉语篇分布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 $p = 0.064$ ),而“首都 B (= 北京)代政府”的模式在分布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00^{***}$ )。这表

明英语语篇更倾向使用该转喻模式。此外,卡方检验还涉及“首都 A”和“首都 B”用于自指和他指时的分布情况(限于篇幅,该部分数据表,未列)。统计结果表明,与“首都 A 代政府”这一模式相比,英语语篇更偏好“首都 B 代政府”的模式,两者分布上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 $p = 0.000^{***}$ );而在汉语语篇中,这两类转喻的使用频率未见显著性差异( $p = 0.090$ )。

表<sub>2</sub> “政府”转喻分布表

源域 (地点)		英语语篇		汉语语篇		p 值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国家		181	61.57%	209	90.87%	.337
首都	首都 A (= 华盛顿)	22	7.48%	12	5.22%	.064
	首都 B (= 北京)	81	27.55%	5	2.17%	.000 <sup>***</sup>
	首都 C	1	0.34%	4	1.74%	.197
	小计	104	35.37%	21	9.13%	.000 <sup>***</sup>
行政区		9	3.06%	0	0.00%	.000 <sup>***</sup>
合计		294	100%	230	100%	$p < 0.001$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下同)

表<sub>3</sub> 政治事件中的“地点”转喻分布表

转喻模式 地点代 (PLACE FOR)	事件 A		事件 B		事件 C		p 值
	观测 频数	期望 频数	观测 频数	期望 频数	观测 频数	期望 频数	
机构 (INSTITUTION)	163	150.71	171	276.34	188	94.94	.000 <sup>***</sup>
(1) 政府 (GOVERNMENT)	152	131.08	144	240.34	158	82.57	.000 <sup>***</sup>
(2) 军队 (ARMY)	11	16.46	16	30.18	30	10.37	.000 <sup>***</sup>
(3) 企业 (COMPANY)	0	3.18	11	5.82	0	2.00	.000 <sup>***</sup>
居民 (INHABITANT)	12	9.24	20	16.94	0	5.82	.000 <sup>***</sup>
实力 (POWER)	5	4.62	9	8.47	2	2.91	.870
产物 (PRODUCT)	0	1.44	5	2.65	0	0.91	.020*

### 3.32 话语参数 (事件参数)

对各转喻模式在 3 个政治事件报道中分布情况的卡方检验产生以下结果(如表<sub>3</sub>所示):(1)“地点代机构”是 3 个事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模式,事件 C 的分布频率比事件 A, B 更高,且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p = 0.000^{***}$ );(2)“地点代居民”在事件 A, B 里使用的频次明显比事件 C 高,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p = 0.0003$ );(3)“地点代实力”与“地点代产物”这两种模式,前者在 3 个事件中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 $p = 0.87$ ),后者因出现频次过少,差异性( $p = 0.02$ )具有很大

偶然性(可作为参考值);(4)在以“机构”的次级范畴为目标域的几种转喻中,“地点代政府”和“地点代军队”这两种模式在事件 C 中的分布频率远比事件 A, B 中高,呈现出显著性差异( $p = 0.000^{***}$ )。

## 4 讨论

基于中美政治语篇地名转喻的详尽分析,我们描绘出其总体的分布情况。那么,该转喻在英汉语篇中的分布有何异同,其使用上的偶合与分

化是否与话语社团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取向存在某种关联?下面我们将着重探讨这两个问题。

首先,地名转喻在英汉语篇中的整体分布存在很大的共性,共享3种转喻模式,即“地点代机构”“地点代居民”和“地点代实力”。“地点代机构”是中美政治语篇中最具统摄性的模式,尤其体现在中美媒体偏好“国家代政府”这一转喻的使用特征上(参见表<sub>2</sub>)。一方面,广泛采用这一模式可以使报道免受报道者个人情感的影响,增强新闻的客观性与真实感;另一方面也可巧妙地隐去幕后的决策机构,同时突出决策群体行动上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将异质性置于隐弊状态。

其次,英汉语篇在同一次级转喻模式具体例示时也呈现出一定的分化。“政府”这一概念参数的分布粒度描写有如下不同:(1)除“国家代政府”外,英语语篇还偏好“首都代政府”的模式,且他指性转喻(北京代政府)的使用频率远高于自指性转喻(华盛顿代政府);与英语相比,“首都”转喻在汉语语篇中的覆盖面明显偏少。他指性转喻的使用可以强化受众对处于不同阵营的意识形态体系国家的负面情绪;美国媒体大量采用该转喻,以激活受众对城市“北京”的心理表征和意识形态定型,因而难免带有对社会主义体制隐性的评价偏见。(2)相对而言,汉语语篇更倾向“国家”转喻,其分布率在“地点代政府”模式中居垄断地位(90.87%)。这一偏好也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中国媒体更注重展现新闻的客观性。(3)“地点代政府”在英语语篇具体化实现时,还例示出“行政代(国家)政府”具有显性政治倾向性的模式。这些转喻分布上的分化可以从某一视角表明美国媒体在构建其话语时有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与评价偏见,而中国媒体则力图建构一个客观公正的大国形象。

此外,“事件”这一话语参数的卡方检验表明,英汉语篇中的具体事件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转喻的选择。显著性检验显示,“机构”转喻,包括两种次级模式“地点代政府”和“地点代军队”,在事件C中的分布频率远比事件A、B中高。高度敏感的政治事件C偏好这两种转喻反映出两国政府对南海问题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比如,“军队”转喻的选用将次认知域“军队”提升至凸显的位置,中国媒体借此使坚定捍卫领土主权的立场明朗化,而美国媒体则传达出隐性的武力威胁之意。与事件C在转喻的选择上呈两极分化的分布形态不同,事件A、B除选用“地点代机构”这一统摄性模式外,还偏好其他几种模式(在

“地点代居民”等的使用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各种转喻的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反映在事件B上尤为突出。这与两个政治事件是在促进两国各领域合作的框架内运作不无关联。

综上所述,两个语言社团转喻的选择体现在同一源域层级的次级分化以及在各事件框架中不同的分布粒度由意识形态驱动。话语者根据种族、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等来界定内—外群体的成员身份,并依此构建对其群体目标有利的的话语。意识形态是社会成员基于共享的社会文化知识在头脑中形成的社会表征网络,它控制并影响某一社会群体对特定领域给予的评价或采取的态度(van Dijk 1998:33)。Moscovici(2001:44)的社会表征理论将萃取(abstracting)视为一种构建社会表征的主要模式,而这一模式本质上是转喻性的(Koller 2014:238),即用范畴的某一特征代表整个范畴的概念化过程;其关键在于经历“从常量转化为变量”的蜕变(van Dijk 1998:84)。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表征方式,同时又是一种认知资源,转喻性表达不仅可以表征由文化规约决定的基本概念,还可影响社会政治语境中某一主题的意义构建;通过突显特定社会现象的不同侧面,话语者诉诸于转喻来展现话语的视角,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将其观点灌输给受众。鉴于其对意义建构所施加的影响更为隐密,“转喻比隐喻更具操控潜势”(Littlemore 2015:103),因而也成为构建群内、群外两分法的重要工具。

## 5 结束语

转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知模式,在塑造人们世界观方面,其力度比隐喻更为强劲,其影响力也更为持久(同上)。因而,转喻同样不是一种超越社会与文化的认知现象(陈敏 2010:37)。本文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依托地名转喻各次级模式在政治语篇中的分布粒度和覆盖度上的特征,考察社会群体转喻语言使用与社会模式间的联系,以揭示转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意义表征连续统中,两极分别为隐喻与非修辞性语言,转喻位于其中部;尽管转喻的识解运作远不如隐喻复杂化,但却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人们的立场观点与价值取向,成为话语社团彰显其权力、实施后台操控的有力武器。而经严格量化的转喻分析可以较为精确地绘制出转喻次级域层级的分化粒度,进而清晰地捕捉到潜存于特定社会群体话语背后概念系统中更为隐晦的意识形态模式与评价偏见。统计技术是从语料库中获取各种有用信

息的主要手段(周强 1995) 统计学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能增强研究的效度,其作用正在日益彰显。

#### 注释

- ①此处须要说明的是,汉语语料库的字数按分词后的字符数量统计,以便与英语语料库保持同步。
- ②在参与语料检索的10个地名中,“西雅图”与“上海”这两个非首都城市因未检索到“市政府所在地代市政府”的转喻性用法,而被剔除。这与我们语料库干涉的是国际新闻,而非地方新闻不无关联。

#### 参考文献

- 陈敏. *Metaphor and Ideology in Economic Discourse* [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 庞陈婧璇 刘永志. 中国自然景点名称的隐喻和转喻研究[J]. 外国语文,2014(1).
- 周强. 基于语料库和面向统计学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J]. 计算机科学,1995(4).
- Brdar, M., Brdar-Szabó, R. The (non) Metonymic Use of Place Names in English, German, Hungarian, and Croatian [A]. In: Panther, K.-U., Thornburg, L., Barcelona, A. (Eds.), *Metonymy and Metaphor in Grammar*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9.
- Cornelissen, J. P. Metonymy in Language about Organizations: A Corpus-based Study of Company Nam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45).
- Croft, W.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4).
-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 [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89.
- Fass, D. *Processing Metaphor and Metonymy* [M]. Stanford: Ablex, 1997.
- Koller, V.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Ideology [A]. In: Taylor, J., Littlemore, J. (Eds.),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London/New York: Bloomsbury, 2014.
- Kristiansen, G., Dirven, R.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ation, Cultural Models, Social System*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8.
- Littlemore, J. *Metonymy: 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arkert, K., Nissim, M. Corpus-based Metonymy Analysis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03(18).
- Markert, K., Nissim, M. Metonymic Proper Names: A Corpus-based Account [A]. In: Stefanowitsch, A., Th. Gries, S. (Eds.),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Metaphor and Metonymy*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6.
- Moscovici, S.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 In: Duveen, G. (E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C].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iao, S., Bianchi, F., Dayrell, C., Degidio, A., Rayson, P.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lingual Semantic Annotation System [P]. The 2015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CL, 2015.
- Radden, G., Köv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Panther, K.-U., Radden, G.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 Rayson, P. From Key Words to Key Semantic Domai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008(4).
- Stallard, D. Two Kinds of Metonymy [P]. Proceedings of the 31<sup>st</sup>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93.
- Taylor, J. Category Extension by Metonymy and Metaphor [A]. In: Dirven, R., Pörings, R.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2.
- van Dijk, T. A.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M]. London: Sage, 1998.
- Zhang, W., Dirk, S., Dirk, G. Variation in the (non) Metonymic Capital Names in Mainland Chinese and Taiwan Chinese [J]. *Metaphor and the Social World*, 2011(1).

定稿日期: 2018-02-16

【责任编辑 王松鹤】